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71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情诗· 哀诗·赞诗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赵德明等译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情诗•哀诗•赞诗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赵德明等译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 03 号

•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

情诗 • 哀诗 • 赞诗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1971 年获奖)

赵德明 等译

*

漓江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上海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25 插页 6 字数 333000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770 册(含精装 1090 册)

ISBN 7—5407—0969—6/I·685

定价: 平 装 9.75 元

彩盒精装 18.25 元



[智利] 巴勃罗·聂鲁达 (1904年——1973年)
(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1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答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胜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

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1982年丛书头4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确认了。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至现在，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90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复以至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先生1981年联合建议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文学奖的颁发往往会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文艺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麻烦，不时会引

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容易使它人言言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50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适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某种局限，有时囿于视野或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到1991年止，中间有7年因战争未授奖，有4年每年授予2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有88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5大洲30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12人，美国9人，英国8人，瑞典7人，德国6人，意大利5人，西班牙5人，俄苏4人，挪威、丹麦、波兰各3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2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冰岛、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15国各1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有2位，而北欧却有12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该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未必与实际相副。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感（受损害的决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

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患“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产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托马斯·曼、黑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居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影响减退，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幅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尽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

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完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3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19种的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弢、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文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

典皇家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责实，一切以质量为依据，以实效为依据。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该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第一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齐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等有关配件，给读者提供较多的信息，提供据以作出自己评判的原始材料。这部分文字名为附录，实乃凤尾，读者对它的兴趣决不在正文之下，而且不可不读。

我们设想通过这些安排，在各卷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容量，提高质量，并共同形成特色，树立整体优势，不独使我国首次译介

的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即使我国介绍过的作家作品也能显示出新的翻译水平和出版水平,让购置了其他版本的读者仍然会对诺贝尔丛书中的新版本发生兴趣。

总的框架和构想确定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和延请对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提出选目,组织翻译,撰写前言,辑录附件。这些工作有的由主持者一以贯之,有的则由他组织同道合力进行而最后总其成。实践证明,各卷主事人选准了,工作做到家了,整个丛书的质量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和中國知识分子赤诚的事业心使我们顺利地得到了语种齐全、实力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等地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共襄此一盛举的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多达200余人。像董衡巽、冯亦代、赵少伟、吴劳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巫宁坤译斯坦贝克,施咸荣译贝凯特,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高年生译伯尔,刘习良译阿斯图里亚斯,吕同六译皮兰德娄,力冈译肖洛霍夫,高慧勤译川端康成,李野光译埃利蒂斯,林洪亮译显克维奇,绿原译米沃什,文美惠译吉卜林,杨武能译海泽,郑克鲁译杜伽尔,郭宏安译加缪,章国锋译豪普特曼,王逢振译赛珍珠,吴岳添译法朗士,倪培耕译泰戈尔,邵殿生译索因卡,袁小龙译艾略特,刘星灿译赛费尔特,申慧辉译肖伯纳,黄梅译高尔斯华绥,石琴娥译拉格洛夫,李之义译海顿斯坦姆,林桦译延森,朱炯强译怀特,宋兆霖译贝娄,荒芜、汪义群译奥尼尔,潘庆龄译路易斯……都可说是恰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

*

*

*

丛书起初是分辑出版的,每辑各书在年代、国家、体裁上稍加搭配并有框架统一的封面,但辑与辑之间年代交叉,封面各异,读者保存和查找感到有些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邀著

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女士统一进行整套丛书的设计,各卷封面统一,书脊上标明获奖年份,便于读者按年代先后排放。平、精装本均有前后环衬、作家肖像和丛书总序、总目,精装本还增加了彩印函套。过去已出的各卷,重印时将统一调整,个别卷为两位作家合出的也将单独分开。预计到1993年,如果还有两位作家获奖,丛书就将恰好排满90卷,以后新增1位增出1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项系统工程也就大功告成并能不断增加活力了。

与丛书配合印行的还有正在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著作以及分类选本等。相信丛书出到八九十卷以至上百卷并有各类相关产品相继问世时,一座座华美的文学殿堂将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道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的壮丽征程。

衷心感谢译者、读者和社内外同仁的携手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1991年12月26日

瑞雪天于桂林

· 译本前言 ·

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赵德明

聂鲁达(Pablo Neruda 1904—1973)的名字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是不陌生的。早在五十年代,他的诗作就已经通过俄文介绍到我国来了;以后,四川、湖南、桂林、北京、天津等地都出版过聂鲁达的诗集、散文集或回忆录。但是,这些译介文字大多比较零散;六十年代以前的介绍又都是从苏联转手过来的,疏漏和谬误的地方更多一些;六十年代以后,由于“文革”的原因,这位智利诗人也同样被打入另册之中;直到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聂鲁达的名字才又重新在我国文学爱好者中间流传开来,这一次不再是从俄文转译了,而是由一支年轻的中国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与翻译队伍来承担译介任务,他们的工作成果为全面认识聂鲁达其人其作铺平了道路。

1991年10月,具有远见卓识的出版家刘硕良先生郑重向笔者提出,《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要“收入一本比较全面、

系统、完整地介绍聂鲁达作品的集子”，“包括聂诗最精彩的篇章和有助于理解诗人诗作的重要散文，并一律根据西班牙语原文翻译，力求以精当的选目、准确的译文，加上学术性长序和附录资料，把我国译介聂鲁达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以进一步向我国读者展示聂鲁达的全貌”。根据刘先生这一要求，笔者邀集林之木、赵振江、林光等同行好友一道商议策划，然后分头行动，经过七八个月的紧张工作，终于赶在1992年7月12日聂鲁达诞辰八十八周年纪念之前完稿了。

为了达到选出“最精彩的篇章”的要求，笔者参考了拉丁美洲、西班牙、美国等国的聂鲁达研究者们的意见，即聂诗最精彩的篇章主要集中在这三部分里：《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大地上的居所》和《漫歌集》。因此，本书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全部译出；《大地上的居所》共有三卷，译出了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五；《漫歌集》中最精彩的《玛丘碧丘之巅》和《让那劈木工醒来吧》，这里也全部选入了。另外，还收入了其他一些诗和散文，共计诗164首，散文9篇。这样，读者就可以在不很大的篇幅里，对聂鲁达及其创作有较多较深入的认识了。

一、大自然是启蒙教师

1971年，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我承认，我历尽沧桑》中，一开篇就把他的童年生活与诗歌创作联系起来，他说：“关于童年的岁月，我首先要说的是，令我唯一难忘的角色就是下雨。南方的大雨像南极飞瀑般地从合恩角直到边境线上从天而降。

就在这个边境地区，或曰我国的Far west^①，我降生到人间，降生到大地，降生到诗歌中，降生到大雨里。”

1904年7月12日，聂鲁达出生在这样一个地区：“雨一个月接一个月地下，整年整年地下。雨水飘泼似地落下来，仿佛一根根玻璃针，砸碎在千家万户的屋顶上，又像是透明的波浪在拍打着窗户，而每户人家就是一条船，驶过冬天的海洋，吃力地抵达港口”，“在我家门前，大街成了一片烂泥海洋”，“我永远都记得那些挨着火盆烤的湿袜子和一只只像小火车头般地散发着蒸气的鞋子。接着，洪水来了，把靠近河边穷人居住的房屋卷走了。大地也在颤抖：地震。有几次，山峦之间冒出了恐怖之光组成的顶戴：耶意曼火山苏醒了。”大雨、地震、火山喷发之外，还有“我被各种各样的鸟、金龟子、野鸡蛋迷住了”，“当我第一次面对大海的时候，我惊呆了。那儿，在两座大山之间，大海怒涛汹涌。不仅有高过我们头顶的无边雪浪，而且还有硕大的心脏发出的巨响，摇撼着天地”，面对这样的自然景观，内佛塔利·雷耶斯(聂鲁达的真名)感到“使我得以窥见一种令人压抑的奥秘”，接着便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1917年7月18日，首次在特木科《晨报》上发表题为《热情与恒心》的文章；次年，在首都圣地亚哥的《跑与飞》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首诗歌：《我的眼睛》；又过一年，以《理想小夜曲》为题的抒情诗参加了省级诗歌比赛并获得三等奖。综观这一时期的作品，固然模仿的色彩十分浓重，但仍可看出自然环境对这位少年诗人的巨大影响，从此，大雨、洪水、地震、火山、森林、花草、昆虫、海洋……成为贯穿聂鲁达毕生诗歌创作的常在元素。因此可以说，聂鲁达这个自然之子，正是在大自然的启蒙下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的。

① 借用美国“西部”一词。

二、《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产生背景和特点

1921年，聂鲁达中学毕业，考入首都智利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法文。同年10月14日，他的长诗《节日之歌》在智利学联举办的诗赛中获得一等奖。他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希望；他想踏入圣地亚哥的文学圈子；他想过起完全城市化的生活；他想……。“那时，我的脑海里充满了书本、梦想和诗歌”，他过着放荡不羁的大学生生活：住在下等公寓里，吃着难以下咽的饭菜，但是朋友成群，特别是女友成群，可以说是生活在友谊和爱情的海洋里。这时，聂鲁达已经拥有自己的读者群。1923年，他的第一部诗集《霞光》正式出版，虽然明显可以看到别的大诗人的影响，但是字里行间已经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语调，一股忧郁的情绪，一种浪漫的气质；在诗歌语言方面，这部诗集反映出聂鲁达十分注意诗歌的音乐性。因此，他的诗容易上口朗诵，这部诗集中的一些诗，有许多读者是可以背诵下来并且在聚会上朗诵的。完成《霞光集》之后，聂鲁达立刻着手创作一部新的长诗：《热情的弹弓手》。这首诗在很晚之后方才正式发表，但是围绕这一诗作曾有一件事广为流传，通过此事可以看出聂诗的个性。聂鲁达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完了这部长诗，几乎是一气呵成；完成之后，起初他颇为得意，自认是很有独创性的。但不久有朋友告诉他：有些段落明显地受了当时乌拉圭现代主义诗人卡罗斯·萨巴特·埃尔卡斯迪的影响。而当时聂鲁达的确很喜欢这位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于是，他把

手稿邮寄给卡罗斯·萨巴特本人。不久，聂鲁达收到回信，证实《热情的弹弓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的影响”。于是，他把手稿锁进了抽屉。此事不大，但很有意义，他成为聂鲁达寻找艺术个性的推动力。

1924年，《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正式出版。这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通过诗歌吐露的心声：忧伤并略带绝望地歌唱纯真的爱情。诗中时而是推心置腹地谈话，时而是忧伤地回忆，时而是动情地呼唤，时而是沉重地思考，总之，的确是聂鲁达自己的艺术风格，即充分地表现了一种淡淡的忧愁。这种情绪很快在那一代青年中得到共鸣，因而这部诗集流传很快、很广，聂鲁达因此而名声大震。文学评论界也很快做出了反应。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情感的流露大胆奔放，艺术形象鲜明动人；形容词的使用独特、新颖；喜欢使用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词汇；诗歌的节奏近似歌曲，因而具有很强的音乐感；为了追求音乐感，诗人往往借助句子的重复，其作用相当于歌曲中的副歌。所有这些特点表明聂鲁达已经悟出语言美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这些特点在他后来的诗歌中都有所发展。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诗人必须热爱语言，永远做语言的真挚情人：“可爱的语汇像有色宝石一样生辉，像银光闪闪的鱼一样跳动；它们是浪花，是丝线，是金属，是露珠……。有些词我总是追随其后……。它们是那样美丽，我真想把它们都放进我的诗中。当它们嗡嗡地从我头上飞过，我急忙抓住它们，紧紧攥在手中，然后把它们梳理、洗净，放置盘中，我觉得它们个个晶莹剔透、活泼伶俐、光洁如象牙，散发着花草的芳香；它们像鲜果，像海藻，像玛瑙，像橄榄……”聂鲁达所爱的语言，是西班牙征服者于十六世纪带到智利的；通过这种语言还带来了欧洲文化；但是这一文化一经接触当地的印第安文化就